

论明清时期榆林城市的空间形态演变

——以方志城图为中心

代剑磊

提 要：明清方志中榆林城图形态表达可分3种：矩形、复合形、凸形，体现榆城发展的3个阶段。矩形在明、清《陕西通志》中常见，形成时间约在正统、成化时期。方志编纂体例使城图准确性有所降低，无法与成书时间形成统一的时空关系。复合形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经余子俊、黄绂、熊绣三拓子城，邓璋修外城、王遴筑逻城后形成的城市形态，仅见于万历《延绥镇志》。子城与逻城相连，与外城分离，明后期方志城图皆不绘外城。清初，受风沙与军事影响，逻城、外城逐渐残损，城图表达中都不再出现，仅剩子城的“凸”状形态。同治初年，北墙内缩，形成“Z”字状的墙垣，但整体上还是以“凸”形为主。方志城图是研究城市形态发展的重要史料资源，不仅有助于厘清不同时期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而且可分析方志编纂与地图史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榆林 城市形态 城市图 方志

图像是人类认知、储存与传播事物的重要文化媒介。地图作为图像的一种，是具有系统性、规律性的特殊文本表达，固定事物时间与空间的视像互动。它直观地反映地表空间的特征，同样受到人类思想发展与科学技术影响，一些地图的空间表现形式出现抽象化，在某些方面上丧失了准确性。城市图作为以城市空间为主的类型地图，它的绘制与发展体现人类聚居生活与城市形态的空间表达。明清以前，城图主要围绕都城及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随着明清方志体例的发展，城图逐渐成为地方志撰修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的方志城图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城市形态的空间演化。

榆林作为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地区中的重要城市，自明初乡村聚落起，之后在区域军事、政治等影响下，经过“三拓”及外城、逻城的修筑，城市面积不断拓展，形态也随之更变，成为延绥地区的集政治、军事、经济为一体的大型城市。清中期，延绥地区行政制度改革，榆城，转而成为榆林府、榆林县的行政治所。现研究成果多以城市形态变迁及“榆城三拓”问题为主^①，尚未结合方志城图及相关城市测绘地图为资料分析明清榆林城市形态者，本文拟以榆林城市为研究对象，对比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中榆城的地图符号，分析城图绘制与城市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探讨明清榆林城市形态演变的时空发展。以方志城图为中心来分析城市形态，不仅可以深化城市作为区域空间演变的研究，而且有利于扩展研究视角，理解城市与地图史发展的内在

^① 参见侯仁之：《从考古发展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与地区发展》，侯仁之、邓辉主编：《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0—139页；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榆林市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30页；陈云霞：《明清榆林城市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营堡卷）》，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5页；李大海：《明代榆林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以“三拓榆城”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王刚、刘翠萍：《明代榆林城的初建与扩建——兼论“三拓榆城”》，《榆林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关系。如成一农所言：“‘图像入史’的关键不在于图像，而在于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图像史料也是如此，我们看待它们的视角越多，它们能告诉我们的也越多。”^①

一 矩形：明清《陕西通志》中的榆林城

《明史·艺文志》曰：“伍福《陕西通志》三十五卷，成化中修。马理《陕西通志》四十卷，嘉靖中修。”^② 嘉靖《陕西通志》（以下简称《嘉靖通志》）是一部关于明代陕西政区的重要地方史志。成书较早的成化《陕西志》，万历《延绥镇志》编修时虽曾作参考，但今已缺失。王邦瑞《陕西通志序》载：“至成化时，马端肃公巡抚陕西，属之提学副使伍子天锡，始撰《陕西志》。”^③ 王九思《陕西通志序》曰：“成化乙未，督学副使伍君天锡作《陕西志》三十卷，板今存者十无六七，格例臧否，未暇深论。而历岁滋久，地有废兴，物有消长，政有因革，风有变移动。”^④ 《陕西志》于成化十一年（1475）成书。赵廷瑞《陕西通志序》曰：“按旧志而三十卷，刻于成化乙未。实钧阳马公巡抚时，属按察副使陵川伍天锡编辑之也。天锡督学此邦最久，其志颇号详雅。顾今阅七年，板佚其半，即秦城巨家，亦罕见其书矣。”^⑤ 成化《陕西志》流传至嘉靖年间，已逐渐残损，雕版也日益衰减，以致与《明史·艺文志》所记卷数产生差异。

由于明代陕西政区的历史特征，《嘉靖通志》所涉及的空间范围，不仅包括今陕西省全境，而且还有甘肃、宁夏、青海等区域。它是由陕西巡抚赵廷瑞监修，马理、吕柟等共同编修的一部翔实、丰富的地方志。嘉靖《陕西通志义例》载：“盖四纲之目，凡二十有八，为卷凡四十。”^⑥ 四纲可分土地、文献、民物、政事，二十八条则包括星野、山川、封建、城郭公署沿革、河套西域、户口、职官、兵防等条目。赵廷瑞撰修《陕西通志序》曰：“嘉靖壬寅十月，陕西布政司刻通志，冬杪告成。予览之终篇，叹曰：‘斯其为陕西通志也已。’”^⑦ 成书时间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其中包括134幅府、州、县、卫所城市建置图，体量之大，较为罕见。建置图里内容丰富，且各具特色，可反映不同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城中建筑空间分布，是研究明代西北地区城市历史地理、城市地图史、方志历史的重要资料。

嘉靖《陕西通志·土地七·建置沿革上》载：“若夫我皇明今日之制作：有城郭焉，其所在山川各异，则规模亦殊；有公署焉，有学校焉，有庙社及诸坛宇焉，其所在方所虽异，而制度则同。悉列之，则剧繁且复；总著之，则挂一漏万，亦未宜也。故于诸建置，各图以尽之，而弁于其首，庶览者按图而征说，若视诸掌云。”^⑧ 建置图与行政建置沿革文字相互结合，但各表其意，并未形成某一时间剖面的城市地图。谢鸿权认为《嘉靖通志》中大量的建置图体现“以图代志”的方志体例，即为替代表述城池、公署等制度的文字而作，当与城郭图、輿图、卷首图考等有所不同。^⑨ 田大刚从其方志所录建置图的准确性入手，认为个别不大准确，但大多数是具有一定准

① 成一农：《图像如何入史——以中国古地图为例》，《安徽史学》2020年第1期。

② 《明史》卷97《艺文志》，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410页。

③ 赵廷瑞修，马理等纂，李之勤点校：嘉靖《陕西通志》，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④ 赵廷瑞修，马理等纂，李之勤点校：嘉靖《陕西通志》，第10页。

⑤ 赵廷瑞修，马理等纂，李之勤点校：嘉靖《陕西通志》，第1页。

⑥ 赵廷瑞修，马理等纂，李之勤点校：嘉靖《陕西通志》，第12页。

⑦ 赵廷瑞修，马理等纂，李之勤点校：嘉靖《陕西通志》，第1页。

⑧ 赵廷瑞修，马理等纂，李之勤点校：嘉靖《陕西通志》卷7《土地七·建置沿革上》，第245页。

⑨ 参见谢鸿权：《嘉靖〈陕西通志〉城市建置图三题》，《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2年第2期。

确性的, 建置图的绘制具有一定的方法准则。^①

《嘉靖通志》中关于榆林的图像表达共有3种, 分别在“全陕疆域图”“延安府疆域全图”“榆林卫城图”可见, 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城市形态。“全陕疆域图”^②(见图1)为陕西政区之总图, 图中名“榆林镇城”, 突显行政驻地的最高级别。城开四门, 位居夹墙之间, 城墙形态、城门数量位置皆与“榆林卫城图”相互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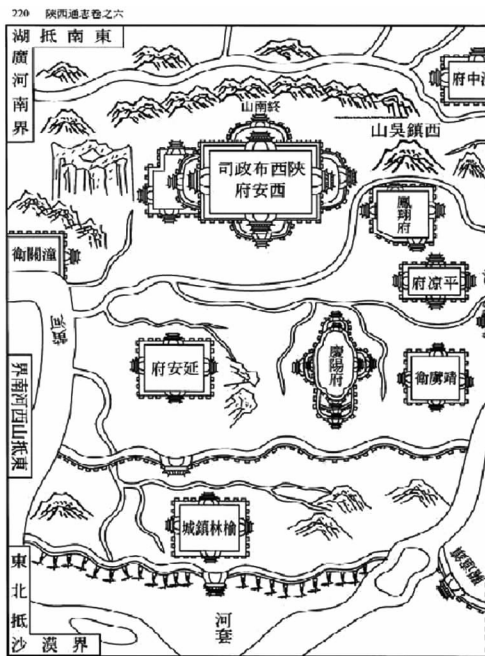


图1 全省疆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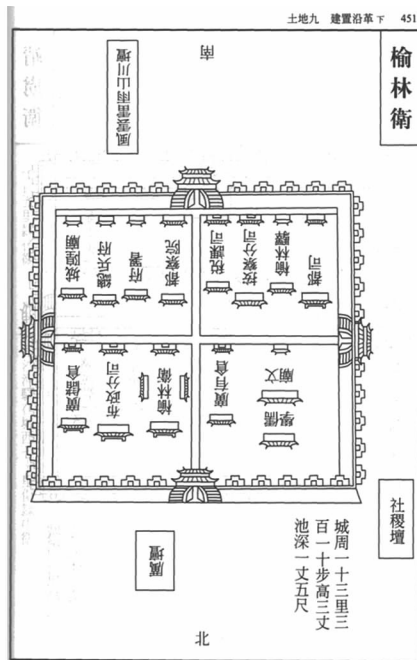


图2 榆林卫城图

根据“榆林卫城图”^③所示, 城墙绘制为立体——平面转化, 以北向南为其平视视角, 北城墙外示, 其余城墙内收。城内建筑的图例多以南北向分立, 名称镶嵌期间, 位置以街道为基准。榆林卫较为特殊, 除南北向外, 另有东西建筑。内部形态为两门正对十字街, 南部另有一条街道, 四门各居城墙中位。再看榆林卫沿革的文字叙述。《嘉靖通志》曰:“正统中, 北虏屡入河套为患, 特敕右府都督王祜镇守延绥等处, 始建议筑榆林城及沿边砦、堡、墩、台以控制之, 遂为镇边重地。成化七年, 都御史王锐建置榆林卫。八年, 都御史余子俊于旧城北增筑城垣, 置榆林卫指挥使司, 隶陕西都司。”^④此内容只限止卫所建立时间, 未有城市演变记载, 体例与其他州县、卫所相互统一。

城内可分四区, 共14个建筑物。为表其建置时间, 括号内容以万历《延绥镇志》(以下简称《万历镇志》)所载为其注解。西南区有都司、榆林驿(在右游击府后)、按察分司(中路按

① 参见田大刚:《试论明代方志建置图准确性问题——以嘉靖〈陕西通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3期。

② 参见赵廷瑞修, 马理等纂, 李之勤点校: 嘉靖《陕西通志》卷6《土地六·疆域》, 第221页。

③ 参见赵廷瑞修, 马理等纂, 李之勤点校: 嘉靖《陕西通志》卷9《土地九·建置沿革下》, 第451页。

④ 赵廷瑞修, 马理等纂, 李之勤点校: 嘉靖《陕西通志》卷9《土地九·建置沿革下》, 第438页。

察司,镇城火器库西,成化中置)、税课司(新鼓楼北,今移南门之东)。《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二年(1499)十月条:“增置陕西榆林税课司,司隶延安府。”^①东南区有都察院(总督府东,天顺中置),府署(即帅府,中城鼓楼西,天顺中置)、总兵府、城隍庙(在榆林卫前第二街,镇城各营堡俱有)。东北区有榆林卫(在儒学东)、布政分司(玄帝庙西,成化中置)、广储仓(玄帝庙内)。西北区有文庙、儒学、广有仓(玄帝庙内)。温仁和《重修榆林卫庙学记》载:“榆林卫,旧未有学,成化壬辰春,肃敏余公建议学城西置隅,以教弁髦之秀者,上可其奏……乙未,镇守太监张公遐以请。丙申,巡抚都御使丁公川乃得终肃敏之意。”^②文庙、儒学最终完成时间在成化十二年。城外有三坛,北为厉坛、西为社稷坛、南为风云雷雨山川坛。建筑位置只体现与其相邻的空间相对性,没有严格按其具体方位标识。另记城墙周长及高度,“城周一十三里三百一十步,高三丈,池深一丈五尺”。城市建筑多形成于成化时期,部分有天顺、弘治年间所筑。城周数值反映的是弘治以后的数据(后详述),但其较为稳定,维持至清后期。数据虽有差异,但始终是方志记载中的榆林城市周长数字。

综合而言,“榆林卫城图”反映地并不是某一时间断限的城市地图,而是以强调政治建筑为主的图像,即谢鸿权所言的另类方志体例。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城邑图的一种惯例,而且在政治机构选择上也与其他州县、卫所的保持一致,体现出《陕西通志》体例的统一性。对比其他治所城图,不难发现如城隍庙、文庙、布政分司皆为共有建筑。但在城市形态与方志时间的统一性上显现出时间差,至少此图并不能真正呈现嘉靖时期榆林城市的空间形态。但“城开四门且为方形”的榆林城市特征在不同方志图集中都有承续。

万历时期,由李思孝、冯从吾等共同编撰的《陕西通志》(以下简称《万历通志》)计35卷,现存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纲目分列有建置沿革、天文、疆域、山川、风俗、户口、城池、兵防、公署、学校、陵墓、古迹等。卷首为图考,附陕西省城图、陕西舆地图等共计18幅。《万历通志》“延绥镇图”(见图3)与“榆林卫城图”的十字街、城门、城墙等建筑分布虽极为相似,却也略有不同,如名称上有所变化。此外,在部分建筑图示上减少符号标识,布政使司增加了左右建筑,取消了南面的街道;删除城市周长记载,添入延绥镇的边墙长度数据。

万历四十一年(1613)前后成书的《陕西四镇图说》,是明代西北四镇边防的重要文献,现仅保留了延绥、宁夏两镇的地图及文字解说。^③关于榆林城的图示有两种,有“延绥镇总图”与“榆林镇城图”(见图4、15),其中“延绥镇总图”所示“榆林镇城”与“全陕疆域图”相似,只是视像表达上有所不同。原为东西长、南北窄,后改为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市形态。

除明代方志沿用外,康熙《陕西通志》(以下简称《康熙通志》)继续采用《嘉靖通志》“城图”的体例。该志由陕西巡抚贾汉复主修,成书于康熙六年(1667)。对比嘉靖“榆林卫城图”、康熙“延绥镇图”(见图6)中的榆林城市,图示存在变化:“加题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其余建筑名称、位置保持一致,道路取消,明代所注方向取消,由三向展开式立面转为类似正南轴测图。”^④又在其旁题注,右侧注曰:“明正统中王禎始建,成化八年,巡抚余子俊增筑北城,周一十三里有奇,高三丈,池深一丈五。”该图丰富了原有城周的单调记载,加入了城市

^① 《明孝宗实录》卷155,弘治十二年十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0册,第2788页。

^②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8《艺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88页。

^③ 参见尚珩:《“国立中央图书馆”藏〈陕西四镇图说〉研究》,《西部考古》2017年第3期。

^④ 谢鸿权:《嘉靖〈陕西通志〉城市建置图三题》,《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2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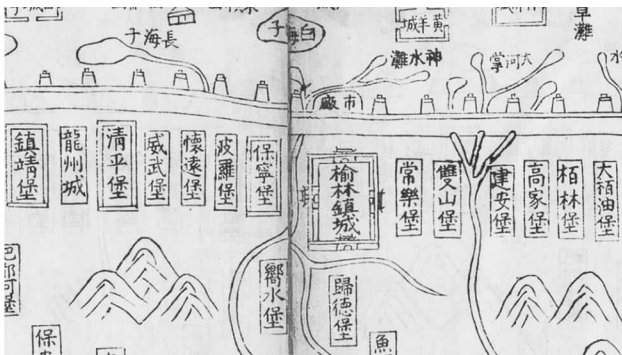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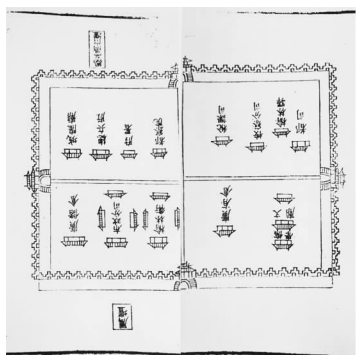


图3 《万历通志》“延绥镇图” 图4 《陕西四镇图说》“延绥镇总图”

起源与发展的变化，但又止于榆林卫设置时间。左侧题：“明初筑东胜等城戍守河外，自己已失守，始议徙镇榆林城，神木以东口河为守，神木以西旧边俱圯。”整体上继续延承《嘉靖通志》“以图代志”的体例。另外还有“延绥所属营堡城图”与“延安府疆域图”，它们所表达的则是另一种城市形态（见图5、8）。



图5 延绥镇所属营堡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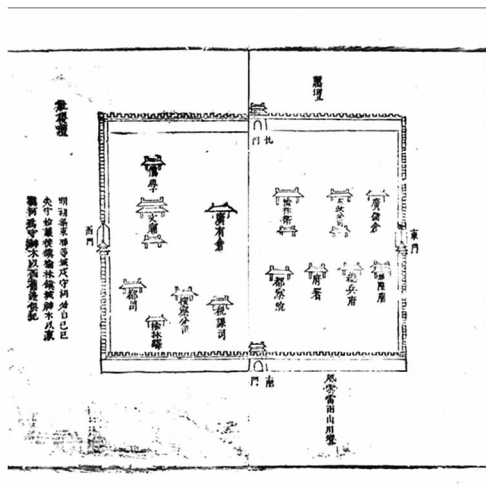


图6 《康熙通志》“延绥镇城图”

嘉靖、康熙“延安府疆域图”中的榆林城图示基本相同。康熙版的东墙由于版刻原因，未能完全表达，但结合西墙、南墙所示，可知二者形态完全吻合。城市形态仍呈方形，共开六门，东二，南一，西三，北无。较之“榆林卫城图”，北门封堵，西墙增二门，东墙增一，十字街的内部格局消失。对比康熙《延绥镇志》（以下简称《康熙镇志》）中“延绥镇城图”（见图19），可知《康熙通志》“延绥镇城图”绘制存误，乃为承袭《嘉靖通志》榆城形态，另在名称、城门处略作修改。

在嘉靖年间成书的《九边图论》里，榆林城出现“左、右各三门，南、北无门”新的城市图示，形态仍呈方形（见图9）。《明史·艺文志》曰：“许论《九边图论》三卷。”^①《明世宗实

① 《明史》卷97《艺文志》，第24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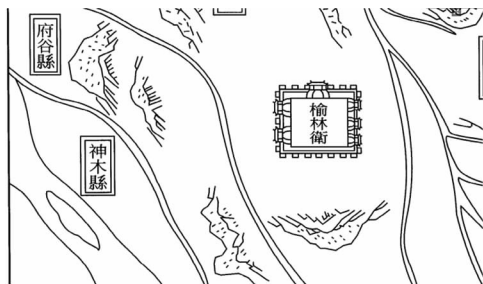


图7 《嘉靖通志》“延安府疆域图”



图8 《康熙通志》“延安府疆域图”

录》嘉靖十六年（1537）八月条曰：“礼部祠祭司主事许伦上《九边论》一本、《九边图》一本，上以其图留览，论下兵部覆议，其言皆有裨边计事开本部者当次第举行，其应行边臣议处者令速议具奏，诏可。”^①《九边图说》于嘉靖十三年绘制完成，十六年呈送明世宗，谢少南的嘉靖十七年刻本基本反映了《九边图论》原貌，是一种军事示意图。^②

《边政考》中“榆林镇城”^③形态仍呈矩形（见图9），但城门数量上增为7个，西墙共4门，东墙2门，南墙1门，北墙无门，与万历《延绥镇志》所载相同。《边政考》曰：“国有老成人，长怀讐谋，罔自暇自宁之心，惟曰边政，边政曰爰命为边政考。嘉靖丁未冬十月既望巡按



图9 《九边图论》“榆林镇图”



图10 《边政考》“榆林镇城图”

① 《明世宗实录》卷203，嘉靖十六年八月辛酉，第41册，第4253页。

② 参见赵现海：《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③ 参见张雨：《边政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第5页。

陕西监察御史张雨。”^①该书完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史·艺文志》载:“《全陕边政考》十二卷。”^②

对比嘉靖、万历、康熙三朝所撰《陕西通志》“榆林城”的空间表达来看,后两者皆承袭嘉靖时期编绘的内容,并做出一定程度修改。直至雍正《陕西通志》(以下简称《雍正通志》)撰修时,榆林城才走出“矩形”体例沿革(见图16)。陕西总图及榆林城图在其方志体例要求下,旨在强调建置沿革的图像示意,城市图的准确性有一定程度降低。

二 主城、逻城、外城:《万历镇志》榆林城市形态

《嘉靖通志》中“城开四门且为方形”或“城开六门”的榆林城是否真实存在过的,或者表现的是什么时段的城市形态,还仅是方志图示绘制的特殊体例?它与万历《延绥镇志》中“延绥镇城图”又存在何种联系?若要解答种种问题,还需回到榆林城的起源与发展。

《万历镇志》载:“我明兴,驱逐胡元,套壤二千里,绝无腥帐,乃镇设于绥。边人擅套之利,负耒鞭牛,出耕牧之。傍寺、沿堡儿山有栅砦,氓居者凿窑孔,亦比比构屋,若村落然。”^③又“国初为榆林庄,民皆傍鼓儿山、龙王泉居之,无城郭”^④。寺为寿宁寺,道光《榆林府志》载:“在县东门内,据碑称唐建,镇志称宋建,历代时加修葺。”^⑤堡儿山,“在中城圣母祠山之巔,由鼓楼东盘旋而上,垂百丈,上有塔,风占谓文笔峰”^⑥。龙王泉,“镇城中,水自山半涌出,汇而为池……其流而下,周灌镇城,中外皆沾其利,即隆冬不冰。西南有寿宁寺,依山俯泉,高下相映”^⑦。

明初,榆林庄仅是一个依山而建,外有栅寨,围绕龙王泉、寿宁寺为主体的乡村聚落。从榆林庄到榆林城的发展与蒙古、明朝双方在河套区域的政治地理格局密不可分。明初击溃蒙古政权,北元退至塞外,明太祖定都南京,于北部边防广置卫所,另封皇子守边。河套地区外置东胜卫,内设延安卫、绥德卫进行协防,扼守南下关中的交通要道。永乐靖难之役后,内撤东胜卫,使其丧失了重要的军事枢纽,河套地区逐渐形成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迁徙的区域。从军事布防的空间关系看,延安卫、绥德卫直接临边,成为明朝与蒙元之间军事对抗的前沿军事冲突区。

正统时期,榆林名称更变频繁,是从屯田聚落发展转变为具有城垣形态的重要发展时期。榆林庄作为绥德卫北部的一个屯田聚落,在区域政治、军事形势影响下,其聚落功能、性质都在不断转变。《巡抚延绥督察员题名记》曰:“时议者不能因河为塞,乃就近地设榆林庄等十八寨,屯兵戍之,遗虏以穴。”^⑧“榆林庄等十八寨”,《寰宇通志》载:“李广寨,在绥德州城东门外;伯颜寨、鱼河寨、双山寨、孤山寨、拜堂寨、榆林庄寨,以上六寨俱在绥德州城北;柳树寨、高家寨、东村寨、柏井寨、神木寨、府谷寨,以上六寨俱在绥德州城东北;响水寨、大兔鹑寨、土门寨、麻河寨、波罗寺寨,以上五寨俱在绥德州城西;自李广寨下十八寨,俱隶绥德卫……以上

① 张雨:《边政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第1页。

② 《明史》卷97《艺文志》,第2415页。

③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8《艺文下》,第611页。

④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3《纪事》,第223页。

⑤ 李熙龄:道光《榆林府志》卷8《建置·祠祀》,“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8册,第214页。

⑥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2《山川》,第109页。

⑦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2《山川》,第114页。

⑧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8《艺文下》,第616—617页。

寨营堡俱有官军防守。”^① 随着兵员驻地的常态化，堡寨聚落数量不断增多，河套地区军事整体防御能力得到加强。同时，榆林庄的聚落形态随之发生变化。

《万历镇志》曰：“（正统）二年，城榆林……正统二年，违绥德北二百五十里，遂城。北至玉皇阁，南至凯歌楼。后凡二展，东西今如制。”^② 又见《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六年（1441）九月己未条，“修陕西榆林庄寨城”^③。庞乃明认为《延绥镇志》记载存误，当以六年为准。^④ 李大海则认为“修”为“翻修”之意，建城之始当在正统二年。^⑤ “正统中，北虏屡入河套为患，特敕都督王禎镇守延绥等处，始建议筑榆林城及沿边砦、堡、墩台控制之，遂为重地。”^⑥ 结合正统二年前后榆林庄附近的军事调整，笔者以为二年所指的是建设榆林庄“寨”的开端，问题在于是否可将“寨”的形态与“城”的行为动作划为同一理解。而六年所言“修榆林庄寨城”则明确提到的是“修城”，体现出城市形态的巨大跨越，“榆林庄”逐渐转变为“榆林庄城”名称指代。至十一年已明确有“城垣”的记载：“镇守延安等处都督金事王禎奏：‘榆林庄城垣原以沙土修筑，天雨颓塌。请俟明年春，扣发军余，择土坚筑。’从之。”^⑦ 十三年九月，“延安榆林庄寨地震，颓其城百二十丈。上命总兵官都督金事王禎等修完之”^⑧。从其颓圮的城垣长度看，可知榆林城已有一定规模。正统时期榆林已形成了北至上帝庙、南至凯歌楼的城市空间范围，如其“凯歌楼，即旧城南门，名怀德”^⑨。

土木堡之变后，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军事逐渐常态化，榆林城内军事机构、行政建筑不断增加。“总镇府在中城鼓楼西，明天顺中置。中路按察司即旧都察院，在总镇府西，明天顺中置。”^⑩ 成化时期，应王锐之请，先于榆林地区新置卫所，后将延绥巡抚治所从绥德迁至榆林卫城。“成化七年，都御史王锐建置榆林卫。八年，都御史余子俊于旧城北增筑城垣，置榆林卫指挥使司，隶陕西都司。二十二年，巡抚黄绂展北城。弘治五年，巡抚熊绣展南城，周围一十三里三百一十四步。”^⑪ 熊绣，《明孝宗实录》载弘治七年（1494）三月“升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熊绣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⑫ 八年十二月，“展榆林城。初，榆林止一小堡，屯兵以备冬。景泰中增设镇巡官，遂为西北巨镇。后增榆林一卫，居人渐繁，旧城狭隘弗能容，乃徙千数百家于城外，至是巡抚都御史熊绣请展其城。从之，命增广千二百余丈”^⑬。熊绣展城在弘治八年完成。自正统筑城之后，经过余子俊、黄绂、熊绣三次拓展，榆林城周达至“一十三里三百一十四步”，与《嘉靖通志》“榆林卫城图”的数据一致。可知，“榆林卫城图”所反映的至少是弘治八年之后的数据。

① 陈循等纂修：《寰宇通志》卷98《延安府·关隘》，“玄览堂丛书续编”，台湾正中书局，1985年，第17册，第248页。

②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3《纪事》，第223页。

③ 《明英宗实录》卷83，正统六年九月己未，第14册，第1665页。

④ 参见庞乃明：《〈明史地理之〉疑误考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⑤ 参见李大海：《明代榆林筑城设卫时间新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⑥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第27页。

⑦ 《明英宗实录》卷147，正统十一年（1446）十一月戊子，第12册，第2898—2899页。

⑧ 《明英宗实录》卷170，正统十三年九月丙戌，第13册，第3273页。

⑨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4《台榭附楼阁》，第286页。

⑩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2《建官附公署》，第107页。

⑪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第27页。

⑫ 《明孝宗实录》卷86，弘治七年三月庚子，第28册，第1601页。

⑬ 《明孝宗实录》卷107，弘治八年（1495）十二月戊辰，第29册，第1962页。

弘治年间拓城之后，原有城市演化为双城格局，渐而出现“旧城”“子城”的叙述。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添兵榆林旧城，外筑保障，内积刍粮”^①。旧城指的北城、中城范围。十六年五月，“陕西榆林大风雷雨雹，折木撒城楼瓦，毁子城垣，移垣洞于其南五十步，震死墩军一家三人”^②。正德末年，改建原南城为凯歌楼。“镇城虽南拓而故址未毁，武皇帝幸榆林，都御史四明姚公模为巡抚，乃因乘輿东悉撤毁之，独留怀德门，削成四方，屹然中立，更名为凯歌楼。”^③自北向南的主街上修筑阁楼，形成北、中、南三城的格局。“钟楼，北城大街，台崇三丈，鼓楼，中城大街，台崇三丈，南鼓楼，南城大街，高六丈。”^④隆庆元年（1567），王遴又在城北修建逻城。“巡抚王公遴自水西门起至信地楼止，筑逻城七里。”^⑤既已了解榆林城市发展，再来看榆林城市的相关图示。

《九边图说》成书于隆庆三年（1569），由兵部尚书霍冀主修。“及照先本部上述许伦先为礼部主事时，曾奏上九边图考，嗣后，本司主事魏焕亦曾续之，迄今近三十年边堡之更置，将领之添设，兵马之加增……例分别冲缓地方以为推升将领之具一为图说，开具山川险易以备。”^⑥今存“玄览堂丛书”所收《九边图说》有“延绥镇总图”^⑦、“延绥镇城图”^⑧的榆林城（见图11、12），两图内容并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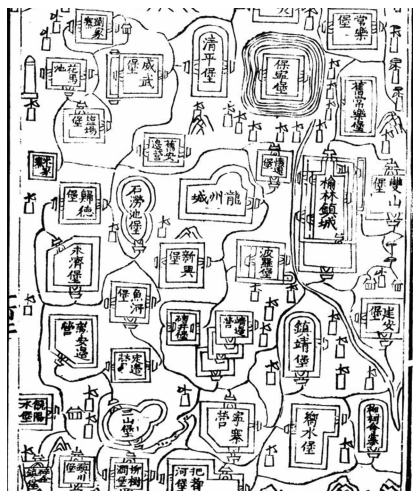


图11 《九边图说》“延绥镇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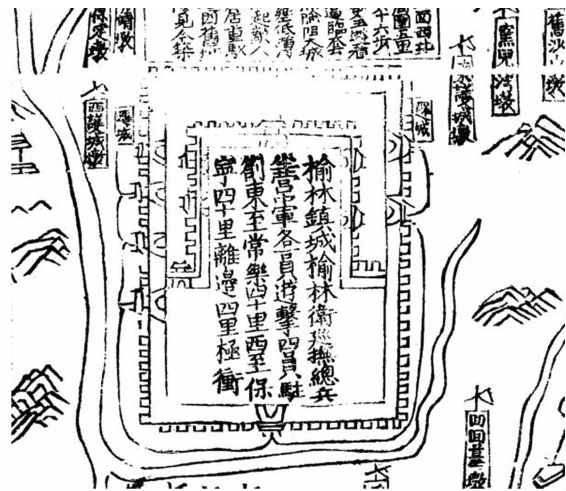


图12 《九边图说》“榆林镇城图”

“总图”呈矩形，内城有城墙分隔南北，外有城墙环绕，共10门。“延绥镇城图”北部有北城、外城，共12门，与“总图”相比，取消了南城、北城之间的城墙间隔。尤为注意的是在外城、内城之间有一小门，是外城与南城之间往来的城门。外城有字标识“逻城”，有5门，西面

① 《明孝宗实录》卷185，弘治十五年三月辛巳，第31册，第3407页。

② 《明孝宗实录》卷199，弘治十六年（1503）五月辛卯，第31册，第3694页。

③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4《台榭附楼阁》，第286页。

④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4《台榭附楼阁》，第286页。

⑤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第27页。

⑥ 参见明兵部辑：《九边图说》，“玄览堂丛书初辑”，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第5册，第3页。

⑦ 参见明兵部辑：《九边图说》，“玄览堂丛书初辑”，第203页。

⑧ 参见明兵部辑：《九边图说》，“玄览堂丛书初辑”，第217页。

3个，东2门，北无。

《万历镇志》是明代边镇方志的重要代表之一。万历年间存在两次编修、两次增修，九年（1581）至十二年为其首次纂修，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形成较为完整的本子，后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四十七年内两次增修。^①“延绥镇城图”可较为清晰地反映万历时期的榆林城市形态。另，“延绥镇总图”中亦有城市形态的图示。两图所示形态相互统一，外有逻城。但在城门绘制上略有不一，总图逻城城门未绘，镇城图中添绘4门。“镇城图”非限于城墙空间，还绘有城外的地理景观。城内未绘城门，内部建筑图示类型较多，有衙署、寺庙、阁楼、引水等，城外有河流、桥梁等。城内主街有五楼耸立中央，东西城门各开与主街相连，组成城市内部街道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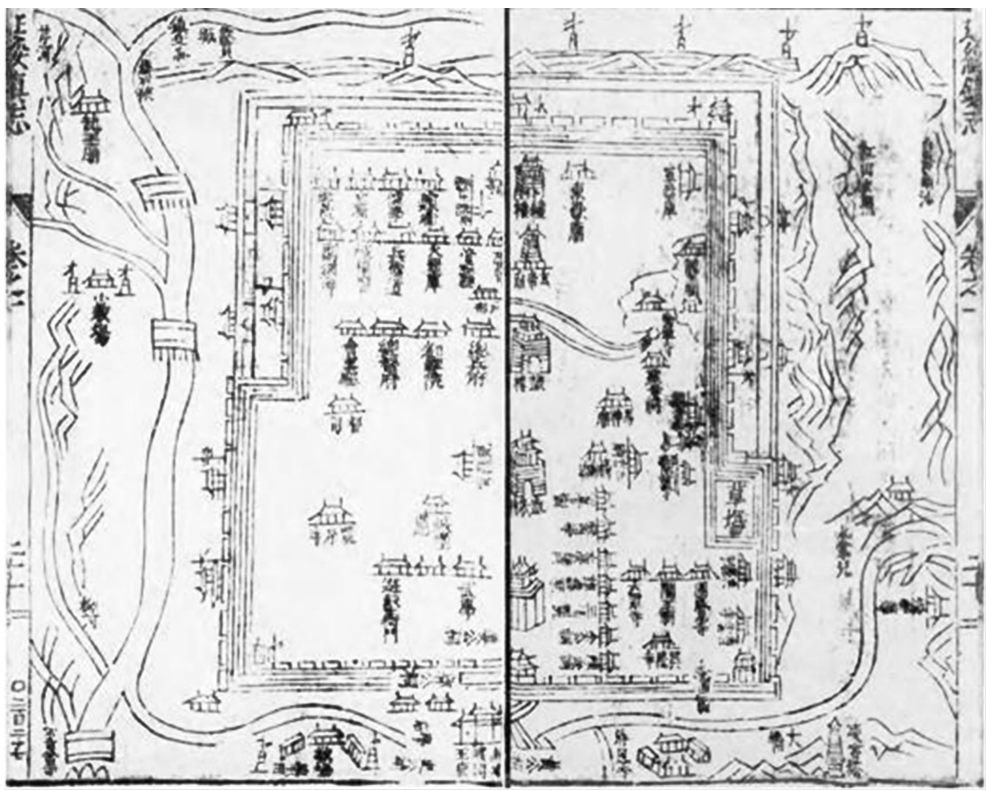


图 13 万历延绥镇城图

正德十年（1515），邓璋在榆林主城以南，修筑外城。“总督陕西都御史邓璋奏：‘榆林卫西北重镇，虏寇不时侵入……镇城南寰人烟辏集，宜筑外城以卫居民。’兵部复奏，从之。”^②《康熙镇志》曰：“南关楼，在镇南郊，上有立马关帝庙，旧为关厢，列客肆，今尽毁而楼存焉。”^③参看图 13，南关城、关王庙标绘为一体，位于主城之外，与“关王庙，镇城二。一在凯歌楼东山，为旧庙，一在南关”^④，所记相符。“南关”指的是南城关厢之意。这一点也反映在方志所

① 参见王应宪：《万历〈延绥镇志〉纂修考述》，《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② 《明武宗实录》卷120，正德十年十一月癸酉，第35册，第3620—3621页。

③ 谭吉聰修，马少甫校注：康熙《延绥镇志》卷2《建置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页。

④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4《寺庙》，第275页。

根据镇罗堡设置时间判断^①，《万历镇志》“延绥镇总图”绘制时间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前，《陕西四镇图说》所载内容应属万历二十八年后。再结合“保宁堡”设置时间，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改延绥新修古梁城名为保宁堡，命绥德守备王国武驻兵守之”^②。所以，万历“延绥镇图”绘制时间断限在嘉靖四十五年至万历二十八年之间。隆庆三年后，榆林城门与内部街道发生重大变化。逻城西墙城门减少至两门，南城新开城门，逻城与南城之间的小门被封闭。而西墙最南的城门新开时间当在万历十年之后。因为万历七年砖修榆林城墙时，有载“于是镇城一十三里有奇，砖工悉如期完。其上如截，其下如苞，其坚如峙。若六门，若镇朔方、信地二楼……工兴于万历七年三月，讫于十年四月。”^③隆庆时期曾重开北门，至万历七年前再次封闭，十年后，新开城门，形成《万历镇志》所记载的“东门二，西门四，南门一”的城市形态。万历二十八年后，逻城东墙城门取消，将内城城门其一南迁。从“延绥镇城图”（见图13）所示的寺庙密集分布看，当与城内东南区域人口增加有关。

三 凸形：清至民国方志中的榆林城图

康熙年间在《万历镇志》基础上新修镇志，名称相同，初次成书时间于十二年（1673）。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延绥镇志》“校注前言”曰：“目前康熙《延绥镇志》的版本主要有四种，即康熙三十三刻本三十四增补本辑本的影印本，康熙三十三刻本四十三年增刻本，康熙三十三年刻本乾隆二十一年增刻本，康熙三十三刻本光绪七年增刻本。”^④该书与《万历镇志》体例相似，内有“延绥镇总图”“延绥镇城图”涉及榆林的城市形态，反映榆林逐渐由“矩形”演变为“凸形”。



图16 雍正榆林县图



图17 道光榆林县疆域图

《康熙镇志》成书晚于《康熙通志》，榆林城图示已变为“凸形”。《雍正通志》在《康熙通志》基础上，由刘于义、沈青崖等共同编修，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图示亦呈“凸形”。至道光时期《榆林府志》时又恢复到“矩形”的城市形态，但“榆林府城图”（见图20）所显示的为“凸形”。这两种不同城市形态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逻城的历史发展。

明人时空视角下，逻城与主城之间存在本质区别。首先，“十三里四百三十步”的城周数据并不包括“七里”逻城。其次，万历年间砖修城墙时，逻城是被排除其外。崔鏞《砖修榆林镇

① 参见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556，嘉靖四十五年三月辛丑，第46册，第8943页。

③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8《艺文下》，第599页。

④ 谭吉聰修，马少甫校注：康熙《延绥镇志》，第10页。

城记》曰：“于是镇城一十三里有奇，砖工悉如期完。”^① 所以，逻城始终为夯土形态的城墙。不过结合其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区域，或为土、沙混合。而在明后期，风沙南移已经影响到边墙的军事防御性能。尤为著名的是涂宗浚“扒沙”事件。万历三十八年（1610），涂宗浚《修复边垣扒除积沙疏》曰：“万历二年以来，风壅沙积，日甚一日，高者置于埋没墩台，卑者亦如大堤长板，一望黄沙，漫衍无际……中路边墙延袤二百四十余里，创自隆庆末年，奈何累年以来，风沙日积，险阻尽失，低者既与墙平，高者过墙几倍。连年虏骑，充斥出没，视若垣途。”^② 经过6个月，清除了常乐堡至清平堡之间240里的边墙外积沙。榆林城北距大边不过8里，风沙向南侵略之下，逻城首当其冲。至清初时，逻城在风沙与战乱的影响下，或已逐渐残损。康熙《镇志》相关“城图”编绘时，逻城形态已无法与主城相比，故在图中不再绘制（见图18、19）。另与《陕西四镇图说》的“榆林镇城”对比，东墙城门的位置恢复至万历时期。除逻城外，邓璋所修的外城在康熙时期已毁坏，以致于城图未见标识（见图19）。



图18 延绥镇总图



图19 康熙延绥镇城图

雍正时期，风沙继续南侵，成为榆林城市治理的重要问题。汪景祺《西征随笔》曰：“榆林兵备……今承平已久，诸事废弛，风卷沙土与城平，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城门无用之物。某莅任后，即会同总兵官，捐资募民去沙，今虽雉堞俨然，然离城仅三丈许，无论一年之后，风卷沙聚，其与城平如故。即使沙不至城垣，而三丈之外沙有高于城者，据沙埠以巨炮击城，城不能守，此一患也；当时有城河故道，河流甚迅，沙可随之而去，今河道久涸，浚之非五六万金不可。无帑可动，无俸可捐，此二患也。”^③ 后又据时任总兵李如柏奏报：“一抵榆林见其城东、西、南三面坚固高峻，惟北面一带沙壅城上，高出一二丈不等，以骑马往来。细为查阅，旧筑有挡沙月城一道，已被沙压不见。”^④ 依榆林城市历史发展，“月城”即为逻城，但残存较少，沙壅之下，仅是依稀可见。

其实不只是逻城，榆林北城饱受风沙侵略。“乾隆五十四年时，北城将陷于沙，知府杨寿南筹议引外头道河水环城而西注之榆溪，为刷沙除害计。”^⑤ 治沙与城市环境之间成为地方行政官

①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8《艺文下》，第598—599页。

② 《明经世文编》卷448《涂司马抚延疏章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4933—4934页。

③ 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卷3《榆林兵备》，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8页。

④ 李如柏：《署四川北总兵李如柏奏陈勘修榆林城管见折》，《雍正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5册，第113页。

⑤ 杨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鲁、吴廷锡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卷8《建置三》，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古籍影印出版社，1990年，第6卷，第343页。

的重要工作。及至道光《榆林府志》时，自是难比雍正时期的残存状态，所以“榆城三拓”撰写者自然不会将其归入城市发展的进程。“按三拓榆城，先置者北城，今之上帝庙高台即当年南城基也。内有钟楼一，今无，而土人犹称为钟楼山焉。嗣将南城展至凯歌楼为止，此楼即当年之南门，现有古怀德门4字，后复展至现在之南门为止，故旧有北城、中城、南城之目。”^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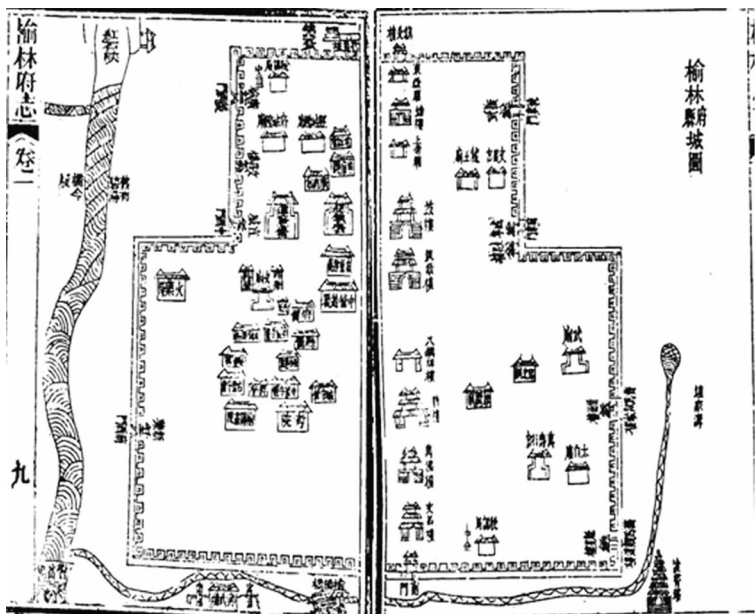


图20 榆林府/县城图

《榆林府志》成书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由李熙龄主修，次年刊印。方志内有两图与榆城形态相关，疆域图前文所述，延续了“矩形”绘制。另“榆林府/县城图”绘制为“凸形”，与康熙“延绥镇城图”相似，则更符合道光时期的榆城形态。与康熙时期城市形态对比，城门数量有所减少，西墙龙德门封闭，其余未变。另外，榆城内部建筑密度分布上出现了向西南变迁，极大改变了榆城内部街道的布局。除南北主街外，南北向又衍生出西城部分的街道，与主街大致“平行”。自南门西行，连接鼓楼、定德门与钟楼、新乐门两条东西向的主街及其他东西巷道。同治年间，回民起义覆盖了陕西北部地区，靖边等一些城市遭到了巨大破坏。榆城，雍正九年（1731）后一直担任榆林府、县的行政治所，由此也成为军事战争重要攻击对象。

民国《榆林县志》载：“‘同治二年，常道宪瀚鉴于本省同州、朝邑之回乱，目睹北城沙压残废，于十月内倡议改筑。时绅士有畏难，阻止此。常道宪一日集绅开议，悬剑于门首，曰‘有阻挠此以军法从事’，群议始息。于是相度地形，弃旧城南徙。筑土为垣，计长四百三十八丈七尺，高三丈，阔一丈八尺……实勘得新北城东北隅距旧城东北隅缩回有一百一十四丈，新北城西北隅距旧城西北隅缩回有一百七十一丈有奇……广榆门又缩回五十七有奇也，北城门名广榆门，即旧西城门改作。”^② 沙漠南迁与区域军事防御的双重影响致使榆林城北墙发生内迁，而内

① 道光《榆林府志》卷5《建置志·城池》，第199页。

② 裘世廉、贾路云等修：《榆林县志》卷5《建置志·城池类》，《榆阳文库》编纂委员会编：《榆阳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缩后的城市空间即为今榆林古城的形态。《续修陕西通志稿》亦有类似记载：“同治二年，榆林道常瀚以回乱为城守，计相度北城沙压，截城南筑新北城，东北隅缩小一百十四丈，西北隅缩小一百七十一丈，弃东岳庙、官井海子于外，旧西城门曰广榆，西城旧凡四门，废龙德门，存定德、新乐二门，废旧咸宁东门，存振武门。”^①

清末“榆林府城图”附字：“榆林府城，一座内土城，周围九里三分，外砖城周围一十四里三百一十四步，东西二里七步，南北五里一百五十步。新筑北土城一道，系旧北城迤南计缩回一百六十四丈一尺，东西长三百七十三丈，底宽一丈二尺，顶宽一丈，高一丈。”《万历镇志》载“城墙”数据：“周围一十三里三百一十四步……万历元年，巡抚张公守中修筑高厚，顶阔三丈，底阔五丈，高三丈六尺。”^②《砖修榆林镇城记》载：“万历七年……于是相与经始，其制高三丈五尺，底阔如其高，顶阔二之一，每十丈一敌台，台高阔，视城有如。”^③三者相比可知，图中城周有误，而各段城墙的高度、宽度都不统一。新修北墙为夯土形态，且相比明代城墙，略显窄低。至光绪二十年（1894），砖修广榆门以西，以东仍为夯土。

城墙内缩后，城市面积、周长都有所缩减。北墙受到驼山的影响，北墙改呈Z字，旨在控制城内外的制高点，便于瞭望外城，加强城市防御能力。“驼山，镇中东面皆山，迤迤起伏，其形类驼，故名。今城半倚其上，庙寺民居簇然。”^④城门数量减少至5个，东、北、南墙各一门，西墙两门。其中提到东岳庙、官井海位居新城之外（见图21）。道光《榆林府志》曰：“东岳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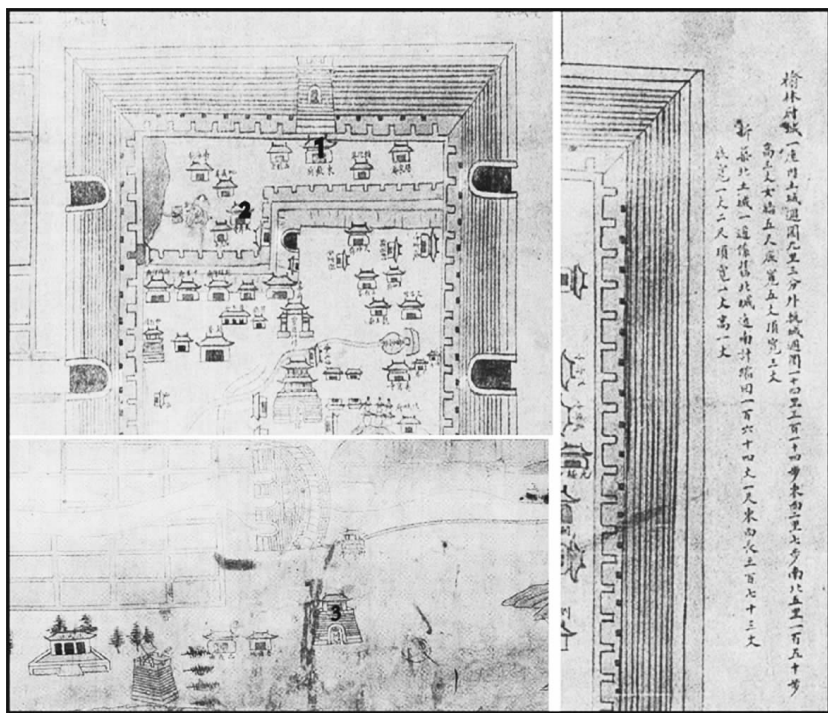


图21 榆林府城图

① 杨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鲁、吴廷锡纂：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8《建置三》，第343页。

②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8《艺文下》，第598页。

③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8《艺文下》，第599页。

④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2《山川古迹附》，第109页。

在城北，明成化年修……天寿寺，旧在城北，明万历建，今移在官井滩。”^①内缩之后不见标识钟楼，可知钟楼亦在城墙之外。万历《延绥镇志》曰：“龙王庙……一在新城卫后，乃成化初巡抚杨公浩建钟楼，掘石而得此泉。”^②杨浩任延绥巡抚的时间在余子俊、黄绂之间，说明钟楼位置在余子俊所拓城市空间内，但不属黄绂展北城范围。民国18年（1929）测绘“榆林县城地图”，比例尺为五千分之一，有等高线。如图22所示，整个城市东高西低，东面多山，西较为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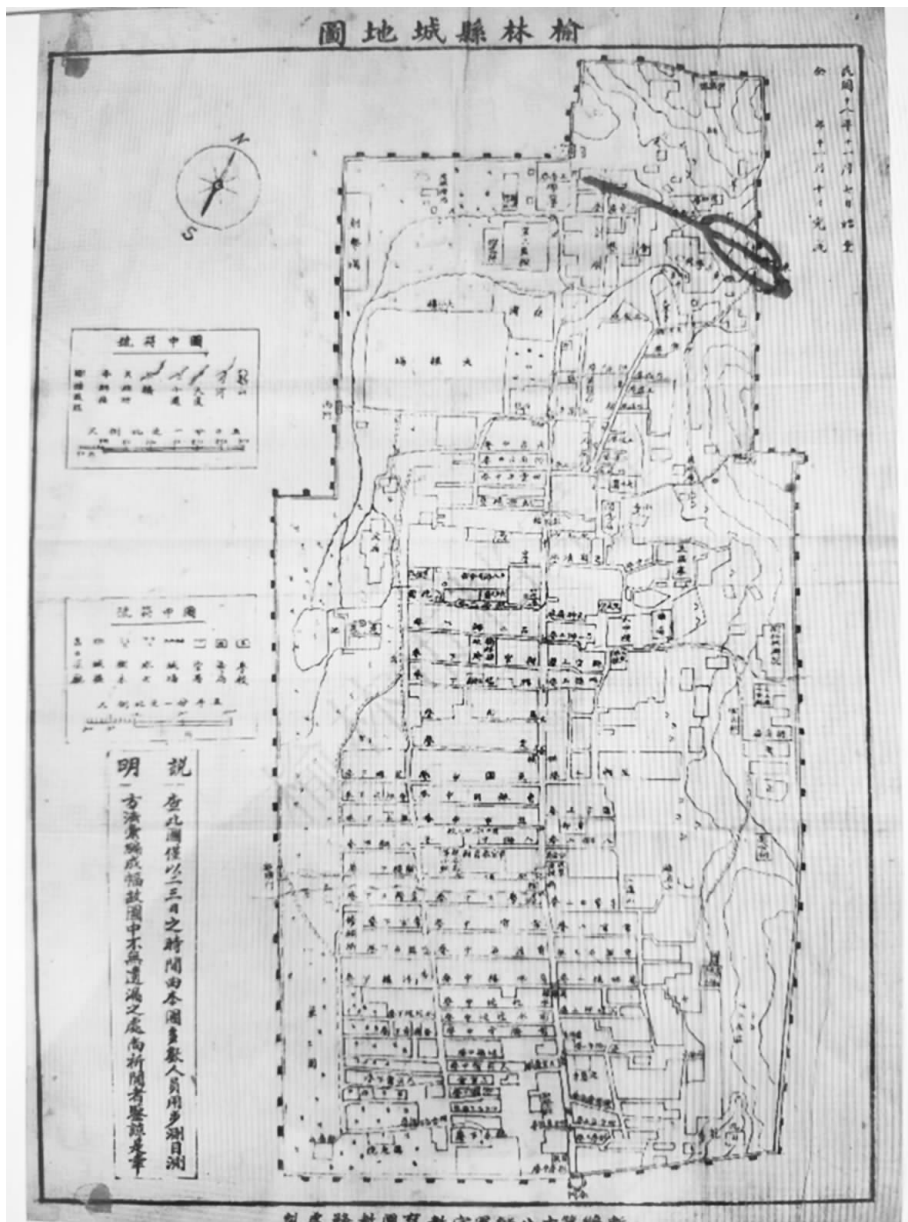


图22 民国时期榆林县城地图

① 道光《榆林府志》卷8《建置志·祠祀》，第214页。

② 郑汝璧等编，马少甫校注：万历《延绥镇志》卷4《寺庙》，第277页。

坦。南北主街有二，其余东西街道纵横。民国时期曾开辟小门，方便城内人员进出。国民党耗时半年翻修城墙，加强军事防御，但城市形态整体并无变动，一直持续至今。

结 语

榆林城，自明初起，开始了新的城市发展道路，这与之前秦汉时期上郡郡城是完全不同的城市起源、发展路径。风沙与军事的地理环境是榆林城市形态演变的两大驱动力。明初仅为乡村聚落，是卫所千户所辖的屯地。正统二年可视为榆林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从乡村聚落向城垣形态转变，形成开四门、矩形的城市格局。这一形态图绘常见于明清《陕西通志》。成化至弘治时期，“榆城三拓”形成北、中、南三城格局。邓璋、王遴又修外城、逻城，形成子城、外城、逻城三城的复合格局，如《万历镇志》“延绥镇城图”所示。与此同时，城门数量不断增加，极大改变了城市内部街道格局，但方志统计多以子城城门为主。清初，外城、逻城相继损毁，仅剩子城，呈凸形，如《康熙镇志》所示。同治二年（1863），在风沙南壅与区域军事影响下，主动内缩城市，形成今日榆林古城的城市形态。方志城图作为了解地方城市形态的重要资料，不仅可以体现不同时代的城市发展演变，而且有助于了解地图史绘制与方志编纂之间的体系关系。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云南省“楚雄州乡土志丛书”（第一批）出版

2021年7月15日，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楚雄州乡土志丛书”发行会，宣告第一批“楚雄州乡土志丛书”全面完成，自2020年8月至2021年7月陆续由云南省人民出版社分册出版。

“楚雄州乡土志丛书”全面、系统地记述楚雄州的乡土地理、乡土历史和乡土文化，为弘扬楚雄州优秀传统文化，激发爱国爱乡情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方志资源和方志智慧。第一批出版的20部，选取楚雄州境有代表性的名镇、名村、名山（水）、民族特色文化和名特资源物产5类，每类4部，每部20万—30万字。“楚雄州乡土志丛书”体例采用纲目体，设纲目、分目、细目3个层次，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横分门类、纵述史实。

楚雄州成系列、规模化地编纂出版乡土志书，在全省开了先例。“楚雄州乡土志丛书”的编纂，对于保留乡土文化记忆、保护开发地方特色资源、扩大楚雄影响力，增强乡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方志网）